

宋代定窯白瓷的歷史定位

森達也 著
王淑津 譯

與汝窯、南宋官窯之比較視點

本文主要以仿青銅禮器製作為中心，透過比較定窯白瓷、汝窯青瓷及官窯青瓷之間的器種組合和差異，試圖考察兩宋時代定窯的特性，並藉以釐清宋代定窯在陶瓷史上的位置。

宋代關於定窯的文獻紀錄，可見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註一)與葉真《坦齋筆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註二)之記載。根據前述文獻，多數論者稱定窯製品在北宋前期被當作宮廷用器進貢，不過到了北宋後期，其地位被汝窯所取代。

的確，五代、北宋前期的定窯白瓷可見「官」、「新官」等刻銘(圖一)，然而，到了北宋後期不見此類款銘作品。此外，目前考古學所確認定窯於北宋中期開始採用覆燒技法，以芒口製品為主流的理解，和前述第二筆文獻的記載內容大致相符。然而根據近年定窯窯址的發掘，從北宋後期的地層中，出土帶有「尚食局」

(圖二)、「尚藥局」(圖三)等宮廷相關款銘的製品(註三)，清楚說明北宋後期定窯極有可能生產上貢進納給宮廷的日常用器(什器)。

另一方面，杭州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跡發掘中，從判定為南宋時代的水池有南宋官窯青瓷、汝窯青瓷、南宋龍泉窯青瓷、高麗青瓷等，與大量定窯白瓷製品共伴出土。此外，杭

之必要。(註五)

本論文主要以彰顯宮廷用器性格的仿青銅禮器製作為中心，比較定窯白瓷與北宋後期取代定窯白瓷宮廷用器地位之汝窯青瓷，以及繼承汝窯地位的南宋官窯青瓷之間的器種組合。透過這樣的比較，筆者試圖考察兩宋時代定窯的性格。

汝窯與南宋官窯的器種構成

筆者曾經針對汝窯天青色青瓷與南宋官窯青瓷的器種組成進行考察，將汝窯青瓷分為四大類別，再加上南宋官窯所特別發展的器種，總共有五大類別。此處根據這五個分類進行考察。

合觀檢視汝窯清涼寺的發掘品與傳世汝窯，成熟期(註六)的汝窯天青釉青瓷器種包括碗、盤、橢圓盤、碟、鉢、杯、托、洗、盆、盒、水仙盆、套盒、執壺、溫碗、雙耳瓶、梅瓶、盤口長頸瓶、長頸瓶、八稜瓶、弦紋長頸瓶、蓮花形香爐、獸足香爐、鏤孔球形香爐造型、三足樽、三足盤、方壺、壺、各種蓋等。這些器



圖二 北宋 白瓷「尚食局」字款碗 定窯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定窯》



圖一 北宋 白瓷「官」字款碗 定窯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定窯》



圖三 白瓷「尚藥局」字款盒 北宋 定窯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定窯》

州市內發現為數眾多帶有宮殿與宮廷設施後刻款銘的定窯白瓷(註四)，根據這些現象確認南宋的皇室與宮殿盛行使用定窯製品。

從以上看來，定窯白瓷從北宋橫跨到南宋宮廷興盛使用的可能性極高。如此前述《老學庵筆記》與《坦齋筆衡》的記載又呈現何種意義呢？再者，定窯與同時代為了皇家而生產製作的汝窯與南宋官窯青瓷的位置又有什麼差異？這些問題皆有再被考慮



圖八 南宋官窯青瓷：V類 老虎洞遺址出土 引自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文物出版社，2002；鄧禾穎、唐俊杰，《南宋史研究叢書·南宋官窯》，杭州出版社，2008

南宋官窯方面，幾乎全數繼承了汝窯前述器種，另外追加模仿了鼎、方鼎、鬲、觚、尊、簋等夏、商、周三代青銅禮器的作品（以下以「V類」表示）。（圖八）筆者認為，南宋官窯仿三代禮器的出現，很可能是緣由南宋初期的青銅禮器數量不足的契機而被生產的。它們開始僅僅是作為青銅禮器的替代品而使用，隨後因青銅禮器的再度生產，仿三代青銅禮器的陶瓷製作從復古性格往玩古（古董趣味）的性格變化而持續生產者。

以下定窯白瓷的分類，將按照前述因應皇帝需求而生產的汝窯與南宋官窯青瓷的器種組成，透過比較定窯

看作從晚唐到五代與北宋的越州窯青瓷、耀州窯、定窯等窯場，共同追摹玻璃器和金銀器的時代動向，而在汝窯的階段，又增加了盤口長頸瓶與蓮花爐（鳥形蓋與獸形蓋）等新器種。這些器種，無論何者都是以唐代到北宋時代倍受珍重的最高級金屬與玻璃器工藝品為原形，因此被認為位居陶瓷器當中最上等的位置。

I、II、III類器種與器形，皆位居汝窯以前的越州窯、耀州窯、定窯（白瓷）等北宋陶瓷傳統延長上的位置。然則，模仿漢代青銅禮器的IV類可以說是北宋後期汝窯獨創生產的新器種與器形，也是考量汝窯天青釉青瓷性格上最重要的器種。IV類仿漢代禮器的器種，很可能反映了北宋時代強烈發達的金石學影響之下，哲宗、徽宗皇帝的玩古趣味。

定窯白瓷與汝窯、南宋官窯青瓷的比較

與汝窯、南宋官窯青瓷之差異，釐清宋代定窯在陶瓷史上的位置。

定窯白瓷的I類（食器與日用容器類），佔居定窯白瓷絕大多數，包含碗、盤、碟、鉢、杯、托、洗、盆、盒、執壺、梅瓶、瓶等。各器種與器形富於變化，並未像汝窯和南宋官窯I類作品那樣定型化與規格化。（註七）帶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款銘的作品，其品質也絕不是出類拔萃地好。帶有「尚食局」款銘者，以碗等食器類居多（圖二），「尚藥局」則以裝納藥品的盒子居多（圖三），從此得知它們應是配合上貢進納的政府機關之需求所生產的。（註八）

II類（以西方傳來玻璃瓶為祖型的器種），以盤口長頸瓶為代表。汝窯與南宋官窯此類作品已經進展到規格化、定型化製作，而且每件作品的器形與口徑、器高、腹徑之比例幾乎一致。另一方面，定窯的器形則富於



圖五 汝窯天青釉青瓷：II類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引自《河南出土陶瓷》，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7



圖四 汝窯天青釉青瓷：I類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 引自《寶豐清涼寺汝窯》

種可分為以下四個類別加以考察。I類：碗、盤、橢圓盤、碟、鉢、杯、托、洗、盆、盒、水仙盆、套盒、執壺、溫碗、雙耳瓶、梅瓶、盤口長頸瓶、長頸瓶等食器與日用容器類。（圖四）II類：盤口長頸瓶與長頸瓶、八稜瓶等以西方玻璃器為祖型的器種。（圖五）III類：蓮華形香爐、獸足香爐、鏤孔球形香爐器形等，摹寫唐宋時期金銀器與青銅器的器種。（圖六）IV類：三足樽、三足盤、方



圖六 汝窯天青釉青瓷：III類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引自《寶豐清涼寺汝窯》



圖七 汝窯天青釉青瓷：IV類 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引自《兩宋瓷器(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寶豐清涼寺汝窯》

壺、壺、弦紋長頸瓶等，摹寫漢代的青銅禮器的器種。（圖七）

汝窯作品這四大類別器種當中，I類（食器與日用容器類）可視為在越州窯青瓷、耀州窯青瓷、定窯白瓷等已經生產許久的北宋時代傳統器種與器形的延長線上，而汝窯天青釉青瓷的特色可說是在其基礎上追求造型之精緻化。II類（以玻璃器為祖型的器種）與III類（以唐宋時代金銀器和青銅器為祖型的器種），一方面可



圖十六 白瓷三足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白瓷五足薰爐 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 引自《中國定窯》

變化，除了與汝窯、南宋官窯同樣器身呈筒形的製品（圖九）以外，也有半球形器身（圖十）與底部帶有高圈足的製品。（圖十一、十二）前者是以陳國公主墓出土伊斯蘭玻璃瓶（圖十三）為原形，帶有高圈足者是模仿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伊斯蘭玻璃瓶作品。（圖十四）在裝飾紋樣方面，可以辨識有素面無紋與施作劃花紋兩種風格。

Ⅲ類（以唐宋金銀器和青銅器為祖型的器種）製品，以北宋初期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九七七年）的香爐為代表（圖十五），其他品類幾乎沒有。

Ⅳ類（模仿漢代青銅禮器的器種），在汝窯、南宋官窯作品可見有三足樽、三足盤、弦紋長頸瓶、



圖十四 伊斯蘭玻璃瓶 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 引自《浙江省博物館》，倫敦出版，香港，2013



圖十三 伊斯蘭玻璃瓶 陳國公主墓出土 引自《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圖十一 白瓷盤口長頸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兩宋瓷器（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圖九 白瓷盤口長頸瓶 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藏 引自《中國的陶磁5·白磁》，平凡社，1998



圖十二 白瓷盤口長頸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白瓷盤口長頸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白瓷三足樽 杭州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跡水池南宋土層出土
引自《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



圖二一 白瓷三足樽 湖南省長沙市楊家山南宋墓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3·湖南湖北》



圖一八 白瓷三足樽 天津藝術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瓷器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



圖一七 白瓷三足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陶瓷全集9·定窯》，上海美術出版社，1981



圖二四 白瓷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並未顯示如汝窯青瓷般忠實地模仿青銅作品原來尺寸的傾向。(註九)

到了南宋時代，南宋官窯與龍泉窯的三足樽有小形化的傾向，不久之後，三足樽具備香爐的使用功能。而，大多數定窯白瓷三足樽可能是作為香爐使用。目前具有有明確紀年的定窯白瓷三足樽，僅有長沙市楊家山南宋墓出土品(一一七〇年)。此資料根據《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3·湖南湖北》一書報導，定年在北宋時代，其口徑為十·八公分，可說是非常小形化的製品，筆者以為該作品不太



圖二三 白瓷三足樽 定窯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定窯》



圖二〇 白瓷三足樽 波士頓 (Boston) 美術館藏
引自《東洋陶瓷·第11卷》



圖一九 白瓷三足樽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東亞博物館藏
引自《東洋陶瓷·第9卷》，講談社，1980

傳世汝窯三足樽有大小兩種尺寸，倫敦大衛德基金會藏品口徑二三·七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口徑十八·〇公分，它們幾乎是根據漢代三足樽的原形尺寸來加以摹寫的。然而，定窯三足樽也有不少口徑在十五公分以下尺寸縮小化的作品，

壺、方壺等器形，但是定窯的器種較少，僅侷限在三足樽與三足盤。定窯白瓷三足樽的例證數量相對眾多，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口徑一四·四公分)(圖十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口徑十五·九公分)(圖十七)、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品(口徑十七·三公分)(圖十八)、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東亞博物館藏品(口徑十三·一公分)(圖十九)、波士頓 (Boston) 美術館藏品(口徑十八·五公分)(圖二十)、湖南省長沙市楊家山南宋墓出土品(一一七〇年)(口徑十·八公分)(圖二一)、杭州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跡水池南宋土層出土品(圖二二)、定窯遺跡出土品(二〇〇九年出土，口徑九·八公分)(圖二三)等等。



圖二六 白瓷鼎形爐 定窯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定窯》



圖二七 白瓷鼎形爐 朝陽營州路遺址出土 引自《朝陽營州路出土瓷器》



圖二九 北宋 政和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可能上溯到北宋時代，應為金代的資料。此外，從杭州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跡水池中發現的小破片，出土於南宋地層。以現階段而言，並沒有資料顯示任何年代可明確上溯至北宋的定窯三足樽作品。

被歸類在V類（模仿三代青銅禮器的製品）的定窯白瓷，比起南宋官窯，器種較為有限。南宋官窯忠實地再現模仿鼎、方鼎、鬲、觚、尊、簋等商周時代主要青銅禮器。另一方面，定窯目前所知只有方壺（圖二四）、簋（圖二五）、鼎（圖

二六、二七）等幾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方壺，其器形模仿晚於商周時代的春秋戰國時代青銅方壺。此類器種並未見於南宋官窯，可說是定窯白瓷極其珍稀的製品。簋類製品，雖然南宋官窯也有相似製品，然而比較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官窯簋形器，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定窯簋器反而與近年在陝西省藍田發現呂氏家族墓出土的耀州窯青瓷簋（圖二八）相近。呂氏家族墓是主導北宋金石學，著有《考古圖》的呂大臨之家族墓，所以該墓也出土呂氏所收集古代青銅禮

器。（註十）呂氏家族墓葬所出土模仿青銅禮器的耀州窯青瓷，並非像汝窯和南宋官窯般是由皇室所訂製生產，而很可能是由北宋著名文人呂大臨本人或是其親近族人直接向藍田縣近郊之耀州窯場所訂製。因之，定窯白瓷的簋器種，或許並非由於皇室的關係，而是受當時宋代文人高漲的玩古意識影響下所生產的器種。

關於鼎，可見於近年定窯窯址所出器身破片（圖二六）與遼寧省朝陽市營州路遺跡出土獸足（圖二七）。前者是模仿長腳鼎（圖二九）；南宋



圖二五 白瓷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八 耀州窯青瓷簋 藍田呂氏家族墓出土 引自《異世同調 陝西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中華書局，2013

器不入禁中」與葉真「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兩筆紀錄，也許可以理解如下：它們並非指陳定窯白瓷不被北宋政府所使用，而是彰顯皇帝身邊主要使用汝窯天青釉青瓷的現象。如此，則可謂真實地描寫出當時定窯的實況。

作者為日本愛知縣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
譯者為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的作品。這種製作風格的嚴謹度暗示著皇帝的要求可以直接傳達到窯場。然而，另一方面，定窯雖然與汝窯相同，曾經作為宮廷使用瓷器被生產並且上貢進納，它卻沒有汝窯天青釉青瓷那般地定形化與規格化，亦即定窯生產並沒有實行像汝窯與南宋官窯窯場般嚴密的管理制度。

此外，定窯生產IV類器種的起始時期，目前還無法上溯到北宋時期，筆者認為很可能要晚到金代時期。倘若此時時間點成立，那麼比起汝窯在北宋後期已經生產強烈反映皇室喜好的IV類製品，定窯與皇室的距離稍遠這件事就更確定了。

從以上現象判斷，陸游的「定器不入禁中」與葉真「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兩筆紀錄，也許可以理解如下：它們並非指陳定窯白瓷不被北宋政府所使用，而是彰顯皇帝身邊主要使用汝窯天青釉青瓷的現象。如此，則可謂真實地描寫出當時定窯的實況。



圖三一 金 耀州窯青瓷鼎形爐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引自《東洋陶磁の展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9



圖三十 張公巷窯青瓷鼎形爐
私人藏 引自《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科學出版社，2009

官窯有素面無紋的長腳鼎，並沒有裝飾紋樣，在河南省汝州市張公巷窯（圖三十）和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可見到類似的作品。此類器種年代能否上溯至北宋時代，尚不明確。獸足鼎可在金代耀州窯青瓷見到類似的製品（圖三一），推定其生產年代在金

代。
從以上情況推論，定窯白瓷V類並非如南宋官窯是根據皇室的命令而忠實再現模仿三代青銅禮器，反而比較可能是因應宋代文人的玩古意識影響所生產的。

結論

北宋末期到金代的定窯白瓷製品，I類屬於碗盤壺瓶盞托等日常器種，種類豐富，占居當時生產製品的絕大部分。

II類（模仿西方玻璃的器種），雖然可見各式各樣器形，但是並未出現如汝窯青瓷II類般定形化的製品。此外，該器類的出現時間，現階段尚未見到可以上溯至北宋時代的資料，有可能是金代時期。

III類有北宋初期的例子，但是中期以降的例子不詳。

IV類可見三足樽與三足盤作品，三足的器形已定形化。其出現時間，現階段尚未無法上溯至北宋時代，可能是金代。相較於汝窯IV類作品，器種要少得多。

V類僅見方壺與簋等稀少器種，相較於南宋官窯V類，器種要少得多。

筆者認為汝窯與南宋官窯的IV類、V類（南宋官窯的新器種）器形被認為直接表現皇家與宮廷的嗜好，因此，從定窯白瓷這些器種數量稀少的現象判斷，定窯與皇室的關係，似乎沒有汝窯、南宋官窯那麼密切。不過，整個北宋時代，定窯白瓷持續為皇室與宮廷所使用，即使到了南宋時代，金領域境內定窯製品仍然大量運送至杭州，卻又說明，橫跨北宋與南宋時代，定窯持續受到皇室與宮廷的喜愛。簡言之，定窯的位置，並不是像汝窯與南宋官窯與宮廷密切，直接領受皇室與宮廷指示，製作迎合皇室嗜好的製品；而是供給宮廷上等實用瓷器的貢窯。

汝窯與南宋官窯的製作，往高度定形化與規格化的方向進展，這恐怕是根據反映皇家品味的精密「樣稿」（訂製圖）所生產製作的。這些「樣稿」被送到生產地，在嚴密的管理下生產吻合樣稿尺寸、器形與紋樣

註釋

1. 明津速秘書本卷一，頁三，轉引自馮先銘，《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臺北：藝術家出版社，二〇〇〇，頁三五。
2. (元)陶宗儀，《南村輯耕錄》，卷二十九「窯器」所引用《垣齋筆衡》紀錄。參見《輟耕錄》，臺灣：世界書局，一九七二，頁四四一—四四七。
3. 秦大樹，〈定窯的歷史定位與考古工作〉，《中國古陶瓷體系·定窯》，北京：北京藝術博物館，二〇一二年九月，頁二五六—二七一，引用頁二六九。
4. 胡雲法、金志偉，〈定窯白瓷銘文與南宋宮廷用瓷之我見〉，收錄於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五，頁二八五—二〇六。
5. 關於這個問題，一九九七年蔡汝芬根據文獻資料進行詳細論考，得出「有芒不堪用」的說法並不足以真確地反映當時定窯真實的情況，本文試圖從別的角度加以論證。蔡汝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五卷第一期，一九九七，頁六三—一〇二。
6. 汝窯窯址的發掘報告《寶豐清涼寺汝窯》將汝窯青瓷區分為「初期」與「成熟期」作品，所謂傳世汝窯青瓷被歸類在成熟期位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五三、一六—一三五。
7. 汝窯與南宋官窯多使用陶範成形，其製作有高度規格化進展的傾向。小林仁，〈汝窯の謎—澄泥為范の系譜〉，《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論文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二〇一〇，

1.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二〇一一。
2.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
3. 張柏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3·湖南湖北》，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
4. 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和器種的比較〉，《故宮博物院八十五華誕宋代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六—一九四。
5.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朝陽營州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七，圖三三。
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朝陽營州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七，圖三三。
7.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朝陽營州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七，圖三三。
8. 穆青，〈七、定窯瓷器的銘文〉，《尚食局》、「尚藥局」款銘文，《定窯藝術》，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頁一七〇。
9. 筆者在〈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和器種的比較〉一文，曾經論述汝窯III類製品的壺與方壺有將青銅器型尺寸縮小的傾向，然而事實上漢代青銅器實物有縮小尺寸版的壺與方壺，因此筆者此處希望訂正觀點如下：汝窯所見小形壺與方壺都是忠實地模仿漢代縮小尺寸的青銅器。
10.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藍田縣五里頭北宋呂氏家族墓地〉，《考古》二〇一〇年第八期，頁四六一—五二。

參考書目

1.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二〇一一。
2.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
3. 張柏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3·湖南湖北》，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
4. 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和器種的比較〉，《故宮博物院八十五華誕宋代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六—一九四。
5.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朝陽營州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七，圖三三。